

漫读周末 看天下



司法改革：以色列国运的十字路口

7月18日，以色列特拉维夫，示威者举起了一面巨大的横幅，他们发起了“抵抗日”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政府的司法改革 视觉中国供图

羊城晚报周末特约主笔 张喆

历时超半年的以色列司法改革法案一石激起千层浪。24日，在以色列议会中反对派阵营56名议员抵制投票的情况下，来自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在强硬右翼执政联盟的全体64名议员通过了司法改革的第一项法案。司法改革案持续引发动荡。自今年1月以来，反对改革的民众不断上街游行示威，7月23日，以色列爆发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示威，高达55万民众上街，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6%。司法改革法案通过后，数十万民众再次上街示威。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警告，以色列有陷入内战的风险。胡德·奥尔默特所言非虚。建国75年来，以色列作为中立的民主标杆，其政治运行总体稳定。而本次司法改革法案投票，暴露了以色列国内已然严重撕裂，且对立双方无法在现行政治秩序框架内达成妥协。以色列再度走到了决定国运的十字路口。

历史问题

内塔尼亚胡与他的极右翼盟友们提出的司法改革提案之所以引发如此大震动，主要是因为改革后将削弱司法权力，加强政府和议会对于最高法院的制约。其中包括在最高法院的法官任命委员会中增加政府代表席位、议会可以通过表决推翻最高法院的合宪审查等。而在以色列现行制度中，以色列高等法院既审查下级法院的上诉，也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否决政府“不合理”的决策。这可以说是“历史遗留问题”。

地缘压力

内塔尼亚胡的“独裁”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应对外部压力的考量。环顾全球，很难找到地缘处境比以色列更为凶险的国家。其国土面积仅1.5万平方公里，人口仅九百余万人，却身处宗教文化长期对立的阿拉伯世界。这让以色列几乎常年处于大大小小的战争之中。频繁的战事需要集中权力、高效决策、高效调动全国资源，才能增加胜算。这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反复得到验证。然而，虎狼环伺中的以色列，却受扶持其建国的英美制度、两千年流落他国的自治习惯影响，建立了议会民主制、三权分立制。在过去，阿拉伯国家普遍科技、军事落后，且互相之间争斗不休，他们之间的仇恨往往大于和以色列的仇恨。以色列议会民主制的弊端尚可接受。

一部基本法规定最高法院可以进行违宪审查，是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阿哈龙·巴拉克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判例的形式，对最高法院进行了扩权。而当前内塔尼亚胡通过议会表决限制最高法院的做法，同样因为没有宪法，而无法判定其是否合法。缺乏法律依据和仲裁的结果，就是正反双方都倾向于以势压人。同时，以色列政治架构过于复杂。以色列不过是一个城市的体量，却制造了比欧美还要繁杂的政治架构。

美国实行总统制，行政权偏重，所以采用三权分立对总统进行制衡。而以色列采用议会制，本来行政权就弱了，还要采用三权分立进行制衡，加上总统的设置，实际上成为“四权分立”。相当于1个人干活，3个人监督，必然是处处掣肘。更改建国时的顶层设计则阻力重重，美国总统拥有对联邦法官的提名权，内塔尼亚胡仅仅试图将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9人委员会中的两个律师协会代表替换为政府代表，就被斥为“独裁”。

如今，沙特、伊朗实现和解，伊拉克也在民主化改革中与什叶派的伊朗走得更近。加上叙利亚的阿萨德稳住了局势，一个团结的阿拉伯世界已在形成中，这将是以色列的噩梦。而以色列的保卫伞美国又撤出中东，很可能随着印太战略的东移再也不回来。内塔尼亚胡需要通过变革寻求更大的权力来应对变局。

路在何方

作为右翼代表的内塔尼亚胡，从1996年以来已担任过5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断连任，本身就反映了世界变局促使右翼力量壮大的现实。内塔尼亚胡回馈支持者的具体做法之一，就是不顾国际反对，坚定地占领土地上新建以色列居民定居点。然而，此举却遭到最高法院掣肘。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在法官任用9人委员会中影响力较大，导致高院价值观念偏左。此前就出现过支持哈马斯的议员被剥夺资格后，最高法院裁定支持其当选的判例。加上缺乏宪法的制约，司法改革支持者认为，最高法院过度使用“合理性”判断介入微行政领域，冲击行政权，导致本来协调难度就很大的议会制内阁更加举步维艰。因此，内塔尼亚胡应该早就想要推进司法改革了。内塔尼亚胡74岁高龄，又当过5任总理，可谓功成名就。若为了个人利益考虑，不至于顶着长达7个月的大规模抗议，冒着声名扫地的风险去推动改革。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个国运的十字路口。议会制内阁本就脆弱，面对如此剧烈的反对，加上内塔尼亚胡欠佳的身体状况，以色列的司法改革凶多吉少。而一旦内塔尼亚胡失势倒台，以色列政坛恐将不稳，很难找到威望相近的领袖笼络小党赢得大选、组织稳定的内阁，并且有手腕压制内部矛盾，带领以色列在复杂微妙的世界局势中前行。

一周热点

莫斯科再遭无人机袭击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28日报道，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28日凌晨，俄军击落了一架企图袭击莫斯科的敌方无人机。索比亚宁称，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没有提供其他细节。

普里戈任“叛乱”后首次在俄露面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7日报道称，根据一个支持俄军军事实体“瓦格纳”的账号消息，“瓦格纳”组织创始人普里戈任于27日在俄罗斯-非洲峰会暨经济和人文主义论坛期间现身圣彼得堡，并被拍到与一名与会非洲国家官员会面。CNN称，这是自上个月“瓦格纳叛乱”以来，普里戈任首次在俄罗斯境内公开露面。

整理/冷爽

柬埔寨政坛巨变

羊城晚报记者 方冬

统治柬埔寨长达38年的洪森26日宣布下月辞任首相，交接给长子洪马内。据悉，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将先于8月10日委任洪马内，待新一届议会8月21日召开首次会议后，45岁的洪马内将于22日带领新内阁宣誓就任。

“骄傲长子”

洪马内的接任是意料之中的。作为柬埔寨首相“骄傲的长子”，洪马内是柬埔寨首个西点军校毕业生，之后又留学英美多年，先后在纽约大学和布里斯托尔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担任过陆军步兵部队副司令、全国反恐部队指挥官等重要军队职务，年纪轻轻就被提拔为四星上将，并参与多项国家的重大政策，以及在国防与外交等会议上频频露面。洪马内早除了国防部职务外鲜少担任政府公职，直到2020年，疫情期间，他创办患者收容中心，有效遏制病毒的蔓延，为柬埔寨获得西方疫苗发挥关键作用，洪马内赢得了更广泛信任，年底他成为柬埔寨人民党青年运动主席。柬埔寨约有600万人民党党员，其中30%的成员是青年人，可见洪马内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在青年人中的影响。在政坛之外，洪马内还热衷于公益事业，创办国家奖学

金惠及柬埔寨的学生，还是青年医生志愿协会的负责人，为乡村地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二代”入阁

如今，随着洪马内即将接棒，柬埔寨政坛也将发生几十年来最大的变化。首先，执政党迎来代际变化，“政二代”陆续登场。和洪森同一时代背景打拼出来的“家臣”年纪都不小了，例如现任国防部长迪班已经77岁、外交部长布拉克萨69岁、商务部长潘索拉拉克68岁，这些洪森的好哥们也都到了扶植二代接班的时候。一个值得观察的重点是，这些老领导的子女会不会在洪马内组阁的名单上。“德国之声”分析称，洪马内的内阁成员可能包括副首相兼内政大臣雷育的儿子以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班的儿子等。也就是说，到8月底，柬埔寨内阁部分成员可能将换成40多岁的年轻人。对于这样的变化，洪森曾表示欢迎：“现在找到了取代我们的年轻一代，我们就把权力移

交给他们，站在他们背后。”

洪森“余威”

柬埔寨的外交会否出现转向也是外界关注点。由于洪马内受过西方精英教育，比较懂得应对国际的游戏规则和潮流（例如环境、人权等议题），他过去几年参与的社会活动主要涉及慈善、环境等领域，最近还成了美国商会慈善晚宴的嘉宾。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洪马内走马上任，可能会为柬埔寨重置与西方的外交关系提供契机。但是，这会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取决于洪森还会在政坛活跃多长时间。短期来看，洪马内和柬埔寨政坛都不太可能脱离洪森的影响。洪森虽卸任首相，但他将继续留任执政党柬埔寨人民党党魁，还计划明年2月竞选参议员，并出任参议院主席。《洪森的柬埔寨》一书作者斯特兰吉奥认为，即使洪森不当首相，他的政治影响力依然不衰。斯特兰吉奥说：“在未来几年内，尤其是洪马内任初期，他（洪森）将扮演支撑

儿子政权的重要角色，确保国内好斗不羁的统治权贵之间保持稳定的平衡。”

此外，即便洪马内可能对西方的态度更友好，但从柬埔寨实际情况考虑，没有太多从政经验的洪马内要想积攒人气，发展经济是关键，而经济发展需求更可能将洪马内推向中国。中国是柬埔寨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柬埔寨最大外国投资来源国。在中美关系处于冰点的当下，如果柬埔寨转向美国的话，对自己只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更何况西方对洪马内也并未“另眼相待”，包括美国和欧盟仍旧批评柬埔寨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平”，美国还宣布将暂停对柬埔寨的部分海外援助项目并对多名柬埔寨公民实施签证禁令。所以，柬埔寨在国际关系上短期内还不会有大幅度调整。对于洪马内来说，更重要的是经受接下来的考验——如何维持稳定过渡，让那些主要因为权力和父辈关系而效力的新内阁成员团结在一起，进而实现他在选举拉票时所说的，“让柬埔寨人民获得比辉煌吴哥时代更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深度解读

“开放组别”游泳比赛会带来什么

羊城晚报记者 赵亮晨

世界泳联主席阿尔·穆萨拉姆近日在日本福冈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上表示，将在游泳赛事中试行“开放组别”，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加该组别的赛事。

跨性别运动员究竟应该参加什么组别的比赛？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上，首次出现了三位跨性别运动员，其中，43岁的新西兰举重选手劳蕾尔·哈伯德成为奥运会历史上首位以跨性别者身份参赛的选手，但已经远离运动黄金年龄的她在比赛中三次抓举失败离场。

在奥运会上，生理意义上的跨性别选手并未引发太多关于比赛公平性的争议。但去年3月，美国跨性别运动员利亚·托马斯在全美大学体育协会举办的游泳锦标赛中夺冠，则引发争议。

在接受变性之前，托马斯是一位男性游泳运动员。她的参赛符合规定，因为她服用了超过一年的睾酮抑制剂。但是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这并不会消除男性身体在这一项目中的竞争优势，因为她仍然保留了男性生物学的特征如骨骼结构和肺功能。据统计，女子游泳比赛的冠军成绩普遍比男子多11%以上，而托马斯变性之后和自己过去的成绩相比，只差了5%甚至更少。支持者则认为，跨性别运动员的性别通常已经在法律和医学层面上得到了确认，既然她在两个层面都被视为女性，那么她理应有权参加女子组比赛。

这的确是一个有些两难的命题：它既关乎运动员——更确切地说是女性运动员在竞技层面的平等，又关乎跨性别运动员作为一个广义的人所应该获得的平等看待。

2004年，国际奥委会就决定有条件地允许跨性别者参加比赛，要求参赛者必须做变性手术，并且在术后两年才可参赛。但现实中几乎没有运动员可以在黄金年龄耽擱两年的时间。2015年，国际奥委会推出了新标准，跨性别女性可以通过抑制血液中的雄性激素水平超过一年，就有资格作为女性参赛。而如果是女性跨性别成为男性运动员，则不受此规则的阻碍。

在托马斯连续夺冠之后，世界泳联（当时的名称还是国际泳联）在去年6月通过新规定，禁止12岁之后变性或经历过任何阶段男性青春期发育的跨性别人士参加女子项目顶级赛事，仅有15%的人在该项目决赛中投了反对票。

世界泳联的“开放组别”设想，可能同样来自托马斯。托马斯并非在女子组“无敌”——她在去年1月的比赛中曾三次落败，战胜她的恰恰是一位“女跨男”的选手艾萨克·海尼格。由于后者没有注射雌性激素，她的身体条件和生理女性的选手相比并没有明显区别，按照规定，仍然可以留在女子组别参赛。

游泳赛事试行“开放组别”会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是，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女子组面对的公平竞争的问题，保障了顺性别女性运动员的利益，相关机构不再需要进行更深入跨性别医学手段对运动能力影响的考察评估；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例如，顶级跨性别运动员数量很少，大赛开放组别的竞争强度存疑。

作为一个试行项目，“开放组别”的效果，也可能对奥运会的其他项目形成参考和示范。公平竞争是体育运动的核心原则，而确保包容性和尊重也是重要的价值观。如何找到一种平衡的方法以满足各方的需求和关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是一个复杂的挑战。